

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

吴 宪

(山东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1)

【内容摘要】直隶义和团运动历时长,蔓延地区广,且是整个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。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相当密切的关系。本文重点探讨了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,并分析其在运动后期态度的转变及分化。

【关键词】直隶士绅 义和团运动 转变

中图分类号 K25

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1007-9106(2010)08-0121-02

一、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

士绅在清代是一个特殊的阶层,它不仅享有国家赋予的各种特权,而且支配着民间社会、经济和文化生活。鸦片战争后,特别是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,清朝中央权力日益削弱,与此相反,各地士绅的地位却在兴办团练、加强保甲中得到巩固和提高。他们上可以济国家法令之所不及,下可以辅官长思虑之所未周,形成前所未有的绅权大张之势,并在地方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。

一般地说,士绅与官府多有交往,过去凡与平民涉讼,他们常处胜讼地位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直隶逐渐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势力聚集的重要地区,大批传教士进入该地区,他们认为:“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,如果我们要对儒家地位取而代之,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,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,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,从而能够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。”^{[1](P233)}所以他们把发展中国教士和教民,作为其势力扩张的关键,而这些人入教后倚仗教会势力,对封建统治秩序和现实等级制度提出挑战。在涞水、定兴交界处某村教民与一举人发生冲突,讼于官,结果该举人被罚酒席和钱。直隶清苑“谢庄附生张玉珞为南乡望族,尝与教民构讼”,因教民有洋教士撑腰,以致张玉珞一直不能打赢官司^{[2](P308)}。教民平时强横,根本不把士绅放在眼里,清苑县进士张冲霄就联合绅民控告教民平日横行霸道。这说明直隶士绅的传统政治地位受到了挑战。

传教士为了便于扩张势力,还在直隶大肆侵占房地产,严重损害了直隶士绅的经济利益。《北京条约》规定将以前没收的教堂、田地、房屋等财产全部退给教会。仅在直隶一省,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,强行要求索还。传教士往往利用年代久远,无从查考,强指绅士华两房屋为昔年教堂,逼令民间退让。在1894年,法国公使曾发给林懋德一张“传教执照”,上面明文规定,在直隶“无论何处租买田地,建造天主堂屋宇,均听其便”^{[3](P2)}。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里,几乎所有士绅的经济利益都和这有限的土地联结在一起,它往往成为许多矛盾冲突的焦点。

如果说传教士对直隶士绅政治、经济利益的侵害是外在、表层的话,那么对其文化的侵害则是内在、深层的。“其绅士居乡者,必当维持风化”。义和团运动爆发后,丰润县的士绅劝说教民“供奉祖先,悬贴门神灶王”。^{[4](P147)}在深州,教民虽得州官允许应考,但找不到一个有功名身份的人为其作保。1894年,吴桥县有一位教民已取得文生,由于外国神甫坚决反对他到孔庙拜孔,结果被革除了功名。^{[5](P420)}不仅如此,他们还极力反对中国人的烧香祷告、求神祈雨、迎神赛会等活动,一些教民借此拒不纳钱,很多教案由此引发。这些行为无疑严重伤害了正统儒士的民族感情。

士绅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,在感到无力维持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情况下,利用蕴藏在社会基层民众中的反抗力量来改变其处境是完全可能的,这应是直隶士绅投身于义和团运动的根源。除此以外,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还与下列因素休戚相关。

其一,义和团在政治上的行动基本反映了士绅的要求和愿望。义和团运动中提出的“扶清灭洋”口号,既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发展和壮大,也符合当时士庶阶层中普遍存在的仇外心理。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,这一口号对于团结士绅起了积极作用。就连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劳乃宣也说,义和团“以扶中朝灭洋教为词,声言为国家出力,非特托名于义,抑且托名于忠。故与教民有嫌隙者为其所动,与教民无嫌隙者亦为其所动,……其簧鼓众听,得力全在此。”^{[4](P473)}杨慕时也埋怨,“其始愚民惑之,今则贤士大夫几乎无一而不为所惑。”^{[4](P354)}义和团的一篇晓谕说:“扶清灭洋,替天行道,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,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,否极泰来之兆也。”^{[4](P148)}这就把斗争的目标局限在只反洋人,不反朝廷和维护统治秩序的范围,符合了直隶士绅的政治态度。

其二,直隶地方官的政策对士绅的影响。吴永曾在《庚子西狩丛谈》中追述义和团运动初起时直隶地方官的态度:“直督裕公本庸儒无意识,颇信拳匪为义民,但尚未敢极端嘉励,一辄依违持两可,以观风色。臬司廷雍则一意徇庇,所之承奉之者,无所不至,拳民由是益骄。”^{[6](P17)}

其三,义和团“神术”对直隶士绅的鼓舞。“盖洋人之炮

* 作者简介:吴宪(1969-)男,山东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,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。

利也,必求所以不畏炮火者;兵精也,必求所以能制其兵者;至此而民之技穷,乃有为之说者曰:胜此者,非神道不为功。于是义和团之说起矣。”^{[7](P486)}此外,“中国受外国凌侮,平民受教民欺压,人人衔恨,无以制之。”^{[8](P404)}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,找不到更好的武器来抵御列强入侵,更谈不上复仇雪耻。在此种失衡心态下的奋发图强,只能寄托于非现实的力量。恰逢此时,义和团“降神附体”、“刀枪不入”的神术犹如久旱后的甘霖,给困惑中的士绅带来了希望。因此“自士绅以致妇孺,皆拍手顿足,喜邀神祝。”^{[6](P29)}“官无论大小,民无论男女,大概信者十之八,不信者十之二。”^{[9](P7)}

2. 义和团运动后期士绅态度的转变及其分化

自1900年9月7日慈禧太后下令剿杀义和团至1902年7月景廷宾在直隶广宗一带起义失败,应视为义和团运动的后期。在此期间,清政府在内外交迫下,对义和团政策由“抚”改“剿”。形势骤变,多数士绅见势不妙,便激流勇退,保持中立,在对待庚子赔款和占领军的问题上表现极为软弱。更有甚者认为时机已到,明目张胆地站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一边,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。只有少数士绅仍然举起反抗的大旗,以各种方式同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进行着斗争,尤其在反对赔款问题上,态度坚决,影响深远。综观此时的士绅,其态度可分为如下几种。

第一种是极力斡旋,稳定社会秩序,维护一方安宁。这类士绅在义和团运动后期居于多数,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高潮时期出于不同目的参与和组织领导了义和团。但在形势逆转时,他们便偃旗息鼓,以中间人的身份周旋于各方之间,并屈从于内外压力,甚至忍辱负重,以求息事宁人。这些士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做了不少工作。

首先是维持治安,办理善后,招抚流亡。在天津,由于局势的混乱,为防止“土匪趁乱抢掠,奸细暗中放火”,士绅张少农等设立铺民局,以便随时巡查,“各处居民,亦皆轮班坐夜,以防不测。”天津沦陷后,士绅李嗣香、少农、卞竹贤、王奎章等人目睹“读书寒士苦状”和贫民生活的困苦,便设法赈济,于是筹银两万两,一面办理文赈,使寒士稍得沾润,一面“移埋各处死尸,赈济各项贫人”。^{[9](P16,58)}在临榆,一些绅董被派下乡,劝说民众“回家安业度岁,以便开春耕种”^{[10](P402)}。他们对战后直隶各地区秩序的稳定和家园的重建,起了很大作用。

其次是周旋于帝国主义和地方官之间,维护了一方的安宁。八国联军兵至临榆县时,知县俞良臣及士绅马恩桂、郭炳照、田国钧等会同商界代表迎联军于南门外,“双方议和,……立约八条,不许外军入城。并由各国派兵把守城门外,军用物均代为采买,官绅竭力支应,城内得保安全。”^{[11](P990)}

再次是保护义和团民。联军进占直隶后,在杨柳青,有教民抓获了义和团民,交与洋火欲杀之,时有士绅“代求宽恕,遂不果杀。”甚至有的士绅将义和团改为民团,以此来保护义和团民。如宁津县太柳镇地主士绅荣襄皋就将义和团改为民团,使匪民免于被害。^{[11](P980)}在霸州也有改团为勇的情况。他们的这些行动在一定范围内保护了义和团民的生命安全。

第二种是讨好帝国主义,出卖义和团。随着中外战局的变化和清政府态度的转变,这类士绅凶相毕露,联合侵略军、清军共同镇压义和团。有的士绅为了讨好侵略军,不仅供应吃喝,还抓捕拳民送与洋人请功。^{[8](P273)}其无耻行径,昭然若揭。有的士绅还充当了民族败类,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。在天津,义和团被镇压后,八国联军成立了军事殖民统治机构——天津都统衙门,将天津分成五个管理区,其成员大部分为士绅。此外,庆云县的安抚局,沧县、密云县的支应局等,都带有类似的性质。这类士绅对帝国主义侵略军大都卑躬屈膝,丧失民族气节。正如易州竹枝词所云:“官绅列队

出迎辉(易州东门名),手举降旗跪路埃。士子未羞亡国恨,却谈‘拳乱惹洋灾’!”^{[12](P116)}不过,这种人在直隶士绅中仅占少数。

第三种是继续坚持反洋教立场。八国联军的侵略暴行,清政府的卖国求荣,给直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。面对此浩劫,有少数士绅激于民族大义,奋不顾身,继续同侵略者和清政府进行着斗争。其斗争方式,一是以和平的方式,据理力争。有一士绅在上李鸿章书中认为,“保府一带拳匪肇祸,概由于教民横行讹索所致”,并指出庚子赔款的不公平,言语恳切,发人深思。^{[13](P137-138)}徐水县南百塔村,联军借查义和团为名,欲搜掠全村。绅士范春霖“正言厉色,拼死力辩真诬”,全村人终得幸免。^{[2](P273)}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沧州南桑园开明绅董备战一事。联军犯沧州,桑园绅董集合团练2000余人,加以训练,并准备了一些洋枪、洋炮。联军逼近沧州,绅董令“闭寨固守,犯则击之”。^{[2](P108)}迫使联军未敢骚扰该地。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,直隶省教案赔款的数目独占鳌头,每年除分担大赔款外,还要承担数额不小的地方赔款。在此种威逼下,有少数士绅以反抗教案赔款为契机,掀起了一系列起义,其中以安平、深州、安国和广宗等州县最为著名。这些起义一般由士绅领导,以联庄会为纽带,且带有反清色彩。1901年春、夏之交,深州武举田燮经联合该州七、八十村庄,成立联庄会,共约2万余人,又与安平联庄会联合七百多个村庄,约二十万余人,形成了强大力量。同年,广宗县武举景廷宾当选为联庄会总团总后,几次组织村民抗议教案赔款,最后终于引发了纵横冀中平原的大起义。景廷宾以文生刘永清为副手,提出了“扫清灭洋”的战斗口号,表明直隶士绅在庚子之变中,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丑恶嘴脸。领导和参加这些起义的士绅,尽管居少数,但他们自觉地将反帝反封建联系起来,把民众反抗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。

直隶义和团运动经历时间长,蔓延地区广,起时如燎原烈火,散时如瓦解冰消,其间与直隶士绅关系是很大的。总体上看,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应视为一支进步的力量,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,他们没有能很好地借助民众——这股革命洪流来肩负起历史的使命。但是,义和团运动毕竟促成了直隶士绅的转变及分化,为其在20世纪初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领域的大显身手打下了基础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顾长声.传教士与近代中国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1.
- [2]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.义和团史料(上)[Z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2.
- [3]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.近代史资料(1963年第3期)[Z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3.
- [4]中国史学会.义和团(四)[Z].上海:神州国光社,1951.
- [5]路遥等.义和团运动史研究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90.
- [6]吴永口述.庚子西狩丛谈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85.
- [7]中国史学会.义和团(三)[Z].上海:神州国光社,1951.
- [8]中国史学会.义和团(一)[Z].上海:神州国光社,1951.
- [9]中国史学会.义和团(二)[Z].上海:神州国光社,1951.
- [10]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.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(第1辑)[Z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4.
- [11]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.义和团史料(下)[Z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2.
- [12]马永祥.易州庚子拾零[M].保定:河北大学历史系油印,1982.
- [13]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.近代史资料(1963年第3期)[Z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3.